



汤一介集

第五卷

在儒学中寻找智慧



汤一介集

第五卷

在儒学中寻找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自序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从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上看，儒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从我关注和研究的兴趣上看，我原来更喜欢道家 and 佛教。只是在 1983 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感到海外学者更重视儒家学说。于是，我开始读一些海外儒学研究学者的著作，而有所得。这时正巧要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邀请了我。为了参加会议，我花了两三个月写了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论文，并在大会中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上作了发言。据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教授的《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纪行》中有如下一段话：“会议的最高潮由北大的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由杜维明教授担任翻译。汤一介认为儒家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通过这次会议，我感到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世界哲学界十分关注的，我们应该十分重视这一份宝贵遗产；我也感到中国学术界能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对话，并且在思想上可以沟通。自此以后，我就经常思考儒学对我们今日人类社会的健康、合理发展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贡献。基于此，我从问题出发来考虑如何从儒学中吸取智慧，历经二十余年，我把注意到的儒学中可能对今日人类社会有益的思想

资源写成一篇篇论文，并发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到2009年，我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一本论文集：《儒学十论及外五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在儒学中寻找智慧》是在《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基础上新编的。它除收录了《儒学十论及外五篇》有关儒学的论文外，又增补了十多篇相关论文及五篇有关儒学的记者访问记。

编完这本《在儒学中寻找智慧》后，我心中有了两个愿望：一是如何把《儒藏》编好，使中外学术界可以得到一套经过整理、作了校点的、可靠并适用的儒学大文库；二是能够写出一本更为系统的、以问题为中心的、适于大学生阅读的教科书。学问是无止境的，只希望一点一点地认真做，以求心安理得而已。

汤一介

2012年11月22日

目 录

论儒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1
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	17
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	21
儒学能否“现代化”?	23
论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	31
论“天人合一”	53
论“知行合一”	67
论“情景合一”	78
论“普遍和谐”	87
论“内在超越”	94
论“内圣外王”	106
论《周易》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构成论	118
论“道始于情”与儒学的性情说	129
论“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	143
论儒家的“礼法合治”	154
“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164
论儒家的“忧患意识”	172
儒学与经典诠释	177
儒学与外来文化的传入	193
儒学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	208
论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	211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226

我们为什么要编纂《儒藏》?	236
再谈我们为什么要编《儒藏》	243
《儒藏》工程的意义、构想及进展	250
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	252
读《南冥集》所得	259
附录一 寻求“全球伦理”的构想	273
附录二 我们在面对一个怎样的孔子	293
附录三 儒学何用? ——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昨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开讲,提出“复兴儒学必须有问题意识”	304
附录四 “反本”是为了“开新” ——专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汤一介教授	308
附录五 尊师重教,首重孔子的精神 ——专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	312

论儒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儒学的“反本开新”

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 21 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

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的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民族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族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应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越深入，它才会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做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家在 21 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二、儒学与“新轴心时代”

在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形势下，人类社会面临的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正因为在这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使得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处在极其错综复杂、矛盾重

重的关系之中。人类社会如何从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之中找出一条出路？在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希望从人类的历史文化智慧中找出一条能使世界走上健康合理的“和平与发展”道路，这无疑是各国人民所希望的前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提出的。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罗亚斯特，形成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起初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传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①例如，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文化是否会有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1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华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的复兴的过程之中，而民族的复兴要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精神支柱，毋庸讳言，“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以“和谐”的观念贡献于人类社会。我们可以看出，自上个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而进入 21 世纪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修养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老子》等等的有关课程内容。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等等。这一潮流，也影响着我国的高层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对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加关注和有较深地研究了。他们知道，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欢迎，200 多所孔子学院的建立，儒学经典将要被译成外国的八种文字，这无疑可以说是儒学在“新轴心时代”得以“复兴”的明证。我认为，中国文化必须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复兴”，必须在吸收其他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先进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中“复兴”，必须在深入发掘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以贡献于人类社会“复兴”，当然也必须在努力寻求我们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资源中“复兴”。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在欧洲，经过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

出现了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①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还认为，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新世纪的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他们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有机整体观，以此反对“现代二元论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中强调，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力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以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② 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自身的前现代传统某些观念加以重视，要重视两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1947年取得了独立。在她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国大党的领袖甘地已采取把印度教和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策略，因此国大党在指导思想和人员构成上都有明显的印度教特征。^③ 上个世纪中期印度思想家戈尔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须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特别强调“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④ 他们认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热忱和宗教精神注入政治中，才是印度觉醒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因此，印度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印度人民党同样崇奉印度教，它是一

① 《为了共同的福祉——约翰·科布教授访谈》（王晓华访问记），载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06-13。

② 参见杰里米·里夫金：《欧洲梦》序言，8页，杨治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③ 参见丁浩：《浅析印度国大党的教派主义倾向及其影响》，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④ 参见汝信总主编：《世界文明大系·印度文明》，5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种以“印度文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或者称为‘印度教特性’”。他们认为，“可将印度现在同过去的光辉连接起来”，“以印度教意识和认同来重建印度”。^①人民党的思想家乌帕迪雅耶提出的“达磨之治论”就是要把印度教“种姓达磨”观念与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其目的是要用这种学说来捍卫印度教的传统文明和精神，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和影响。国大党和人民党交替执政，就说明印度教在印度的复兴。^②这有力地说明印度正是“新轴心时代”兴起的一个重镇。这是不是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和欧洲都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他们都将再一次得到“复兴”的机会？我认为，雅斯贝尔斯的看法是有远见的。这里，我必须说明，我并没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将会得到“复兴”的机会，如拉美文化、中东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三、儒学的三个视角

在这可能即将出现的“新轴心时代”，面对着与两千多年前的那个“轴心时代”的形势是完全不同了。全球化已把世界连成一片，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其自身社会的问题，而且要面向全世界。因此，世界各国、各民族理应将会出现为人类社会走出困境的大思想家或跨国大思想家集团。实际上，各国、各民族的有些思想家已正在思考和反省人类社会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局、迎接一个新时代的种种问题。在此情况下，各国、各民族

^① 参见曹小冰：《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统治》，237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② 参见汝信总主编：《世界文明大系·印度文明》，555～558页。

的历史文化经验和智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历史的主流文化“儒学”应有一总体的认识和态度是很必要的。

由于儒学是历史的产物，又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在今天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或可能怎样看儒学，我认为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儒学，一是政统的儒学，二是道统的儒学，三是学统的儒学。（1）政统的儒学：政治化的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专制政治结合，所提倡的“三纲六纪”无疑对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因而对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稳定的作用。但是，把道德教化的作用夸大，使中国重“人治”而轻“法治”，而且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而美化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使道德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当然，在专制政治统治的压迫下，儒家的“以德抗位”、“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理想也并非完全丧失。不过总的说来，政治的儒学层面对当今的社会而言可继承的东西并不太多，它存在着较多的问题。（2）道统的儒学：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派别，必有其传统，西方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儒、道、释三家都有其传统。儒家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并且对其他学术有着较多的包容性，他们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既成学派难免就会有排他性。因此，对“道统”的过分强调就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在历史上某些异端思想的出现，恰恰是对主流思想的冲击，甚至颠覆，这将为新的思想发展开辟道路。（3）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它的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虽不能说儒学可以解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儒学在诸多方面可对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较为丰厚的

资源是无可否认的，应为我们特别重视。我这样区分，并不是说这三者在历史上没有关系，甚至可以说在历史上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只是为了讨论方便，为了说明我们应该更重视哪一个方面。基于此，我认为，当前甚至以后，儒学的研究不必政治意识形态化，让学术归学术；而且儒学应更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与各种文化的广泛对话中发展和更新自己。

既然我们对儒学要特别重视的是其“学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学统”的角度来看儒学，我有以下四点看法：（1）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植根自身文化土壤之中，必须有文化上的自觉，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的民族，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被同化。（2）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罗素说得对：“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①。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有着吸收和融化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宝贵经验，应该受到重视。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我们应更加善于吸收和融合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使中华文化更具有世界意义。（3）社会在不断发展，思想文化在不断更新，但古代思想家提出和思考的文化（哲学）问题，他们的思想的智慧之光，并不因此就会过时，有些他们思考的问题和路子以及理念可能是万古常新的。在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一书中，他认为：在科学方法的运用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超过了

^① 《中西文明的对比》，见罗素：《中国问题》，14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亚里士多德，但就哲学本身而言，我们很难再达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水准。哲学历史的某些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后代的哲学家就一定超过前代。^①（4）任何历史上的思想体系，甚至现实存在的思想体系，没有完全正确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的学说，它必然有其局限性，其体系往往包含着某些内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价值）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者。”^②这里所说的“体系”是指那种无所不包的、自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往往都是谬误之论。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③我认为这两段话对我们研究思想文化都很有意义。因为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今天和明天的全部问题，就儒学来说也是一样的。正因为儒学是在历史中的一种学说，才有历代各种不同诠释和批评，而今后仍然会不断出现新的诠释、新的发展方向、新的批评，还会有儒家学者对其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的揭示。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不断

① 参见李雪涛等译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的《论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代“译序”》，1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 恩格斯：《世界是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恩格斯〈反杜林论〉参考资料》附录，137页，1962。

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马元德译，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反思儒学存在的问题（内在矛盾），不断给儒学新的诠释，不断发掘儒学的真精神中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和特有的理论价值，遵循我们老祖宗的古训“日日新，又日新”，自觉地适时发展和更新其自身，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四、儒学与“和谐社会”建设

在 21 世纪初，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对人类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生存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知道，“和谐”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可以说已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理想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提供某种理据。《中庸》中的“中和”思想，要求在各种关系之间掌握适合的度，以达到万事万物之“和谐”的根本。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① 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阐发，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普遍和谐”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和谐”的意义，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意即“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所有这些包含在儒家经典中的“和谐”思想，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对人类社会极有价值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

^① 《周易·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全世界又遇到了什么问题，都是复兴儒学必须考虑的问题。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对“问题”有提出解决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是有真价值的理论。当前，我国以及全世界究竟遇到些什么重大问题？近一二百年来，由于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残酷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吸毒、自杀、杀人，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无疑是人类要面对的最大课题。其中“人”的问题是关键。

针对上面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若干有益的思想资源。

（1）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不能说与西方哲学曾长期存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没有关系。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极近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①这就是说，在西方哲学中长期把“天”和“人”看成是相互独立的，研究“天”可以不牵涉“人”；研究“人”也可以不牵涉“天”，这可以说是一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91页。